

从官学到书院：明清教育重心之转移*

刘艳伟**

一、“明代学校之盛”
二、“匡翼夫学校之不逮”
三、清代书院地位之确立
结语

【中文摘要】

明清两代，教育重心有由官学向书院转移的趋势。明前期官方构建了完整的学校体系，书院被排除在外；明中期以后，地方官员、提学官开始寻求学校之外培养人才的途径，认可了书院“匡翼夫学校之不逮”的地位；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促进了书院的发展，随着书院在聚徒课士、膏火养士等方面优势的凸显，教育之重心逐渐转向书院，以致产生了“教士之实，莫如书院”的观念。书院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及士人书院观念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实践层面，并最终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官学 儒学 书院 教育重心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309083694@qq.com)

【국문초록】

관학에서 서원으로
-명·청 시기 교육 중심의 전환-

유염위(劉豔偉)*

명-청대에 걸쳐 교육의 중심이 관학으로부터 서원으로 이행하는 추세가 발생하였다. 명대 전기에는 관방에서 완전한 학교 체제를 구축하였으며, 이에 서원은 배척되었다. 그런데 명 중기 이후, 지방 관원과 제학(提學) 관원들이 학교 외부에 인재를 배양할 수 있는 장소를 탐색하기 시작했고, 그들은 서원을 “학교가 미치지 못하는 부분을 보충하는(匡翼夫學校之不逮)” 역할을 할 수 있다고 생각하였다. 청대 옹정(雍正), 건륭(乾隆) 연간, 관방은 서원을 지지하여 그 발전을 촉진하였고, 서원에서 생도들을 모으고 선비들을 가르치며, 배양하는 등 여러 우수한 성과에 힘입어 교육의 중심 또한 점차 서원으로 옮겨 가게 되었다. 이로써 “선비 교육의 실질로는 서원 만한 곳이 없다(教士之實, 莫如書院)”라는 관념이 발생하였다. 이러한 전체 교육 체계 가운데 서원의 지위 및 사인(士人) 서원에 대한 관점의 변화는 당시 교육 시행 차원에서도 영향을 끼쳤을 뿐만 아니라, 궁극적으로 근대 중국 교육 구조의 형성에도 영향을 미쳤다.

주제어 : 관학, 유학, 서원, 교육 중심

* 서화사범대학(西華師範大學) 역사문화학원(歷史文化學院)

书院在宋代兴起之后，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官学之外最为重要的教育机构。然而，书院的历史并非直线发展，不同时期的书院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亦时有升降。与其它时代相较，明清两代堪称书院史上的特殊时期。有明一代，书院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影响不及宋、元。而至清代，书院则达到了历史高峰，不仅数量为历代之最，且在教育中的地位也非其它朝代可比。以往的书院史研究，学者们通过计量统计，呈现明、清书院的数量、规模，及其在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¹就书院在当时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影响，学者们或有论及²，但并未作系统性地考察。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将书院放至当时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探究明清两代书院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地位及其变化，从另一角度呈现书院发展变化的历史图景。

一、“明代学校之盛”

明建国后，统治者建立了完备的官学系统。洪武元年(1368)，“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³。洪武二年(1369)，“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⁴。在此政策下，“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⁵。洪武八年(1375)正月，因“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

1 如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30年第113·114期)·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对清代书院的总量·分布都有统计。

2 邓洪波曾指出(2012)，“书院与科举结合而趋于取代官学”是乾隆时期书院发展的一个特点。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第489-490页。

3 《明史》卷69《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第1676页。

4 《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6页。

5 据吴宣德统计，到洪武末年，全国府州县共有儒学1054所，占当时全国府州县总数的73%。至万历年间，儒学总数超过了1435所，当时府州县有94%左右都设立了儒学。由此可见儒学设立的普遍性与规范性。见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172-175页。

睹教化”，乃诏谕全国，设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⁶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官方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系。明人评价国初的教育政策，称：“天启皇明大一统之治，开万载太平之业，在内则立胄监，在外则府州若县莫不有学，而学之教法规制盖已超轶汉唐宋，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⁷“我朝受命以来，圣圣相承，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无地而无学，无人而不教，立卧碑，颁书籍，简命重臣以维持之，又敕宪臣以专主之，其所以惠学校裨治化甚盛大也。”⁸清人修《明史》之时，也盛称明代的官学教育：“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迭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⁹

与日臻完备的官学相较，明初的书院则甚为沉寂。建国之后，官方先是改山长为训导，将书院主持者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中，书院被当作官方教育机构对待。洪武三年(1370)全国遍设儒学之后，又革罢书院训导，令书院生徒归于地方儒学。少数书院在政府的倡导下重建，但其功能主要在于祭祀，不少宋元以来的书院被并入官学和社学，宋元以来的著名书院大都处于无人管理的闲置状态，少数地方官重修或新建的研习程朱理学的书院，规模及影响都很小。¹⁰一些书院即便有文化活动，也以个人藏修为主。¹¹此外，统治者对书院也不甚重视。弘治元年(1488)，常熟士人周木请求修复常熟县学道书院，礼部认为学道书院祭祀孔门弟子言偃，宜准其奏，并免除偃氏后裔徭役，“以慰其乡人景仰先哲之心”。孝宗皇帝则“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且偃已通祀于学校，不宜重劳民创建”¹²为由，没有批准。

明前期书院的沉寂，实受官学发展的影响。民国学者盛朗西即称：“宋元

6 《明太祖实录》卷96，洪武八年正月丁亥。

7 (明)杨荣：《文敏公集》卷10，明正德十年刻本。

8 (正德)《光化县志》卷2《学校类》，明正德刻本。

9 《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6页。

10 李国钧主编(1994)，《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44-545页。

11 白新良(2012)，《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第66页。

12 《明孝宗实录》卷14，弘治元年五月丁卯。

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络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¹³就明代士人而言，他们在回忆明初的教育情形时，也往往突出官学的地位。弘治十二年(1499)，舒城县主簿何雍修建龙眠书院，工竣后，邑绅秦民悦为之作记。在记文中，秦氏提及创建书院之目的时称：“肆惟祖宗创业垂统，建学育才，在在有之，若无俟于书院也。”¹⁴尽管此言是为后文书院建设之必要性张本，但也反映出当时官学的主导地位。弘治十三年(1500)，温州知府邓淮建鹿城书院，祀二程、张、朱，以温州地方门人从祀，又辑录诸人墓志、家传、问答等内容，汇为《鹿城书院集》。邓淮为该书作序，在序文中，邓氏也提到“夫以圣朝学校遍天下，若无俟于书院者”¹⁵。

二、“匡翼夫学校之不逮”

(一) 明代官学教育的衰落

明初建立起完备的教育体系，官学教育兴盛。但政府将学校定为“诸才以应科目”的科举预备场所，为后来儒学教育的衰败埋下了隐患。洪武朝选官不拘资格，科举、学校、荐举、吏员多途并用，地方儒学生员可依例进入国子监，获得入仕资格，且位居通显者甚多。随着科举制度的稳定推行，明中叶后，科举一途日趋重要，其它三途已不复有明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秀才授尚书”的盛况。而且，在科举的影响下，原本需要在学肄业、研习经史的士子们寻求科场得隽之捷径，放弃对四书、经义的钻研，热衷于背诵程文。正统元年(1436)，户部尚书黄福上书揭露学校的弊端，称：“近年以来，

13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3编第45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第77页。

14 雍正《舒城县志》卷31《艺文》，清雍正九年刻本。

15 弘治《温州府志》卷20《词翰二》，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各处儒学生员不肯熟读四书、经史、讲义理，惟记诵旧文，待开科入士，以图幸中。”¹⁶清人评价明代学校，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嘉隆以还，教官不过具员，号舍竟同虚设，学使者岁科考校惟论文艺，虽有修法博习之士，无所用之。由是士日濡首于八股之中，揣摩掇拾，以求科第而博富贵，即诗书六艺亦且视为赘疣，置之不讲…”¹⁷

除了受科举影响之外，儒学在制度设计之初，便存在问题。儒学教官品卑俸薄、久任难迁，且时常面临其它进士出身官员的官威凌压、师道不尊等，¹⁸造成了教官队伍素质低下的局面，这无疑会影响地方儒学的教学。生员不在地方儒学肄业是官学另一个问题。朝廷规定“师生每日坐斋读书，及日逐会课，有司签与斋夫、膳夫”¹⁹，但到了弘治年间，已然出现“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²⁰的情况。今人陈宝良论及明代的儒学，称：“自明代中期以后，教官之黜陟，生员之充发，均废格不行，即使卧碑所列各种禁例，亦只是一纸具文。地方儒学更是有堂不升，有斋不讲，凡饮、射、读法、膳会礼仪并一些规条课业，更是久已废置不行。就拿儒学学宫来说，其后也日渐陵替，只是用作供奉先师、居停学博，或者有司春秋二时丁祭、朔望行香之地而已，甚或庖为牧，泮为渔，圃为蔬，舍为薪，无怪乎士习日偷，放荡于礼法之外。”²¹

面对学校的弊端，官方一直在进行整顿。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当是提学官的设置。正统元年(1436)少保黄福奏请加强对儒学的监督管理，明廷遂在各省设按察司官一员，南北直隶各设御史一员，专一提调学校，并颁给提学官敕谕，作为施政纲领。²²但从地方官学最终的情况来看，提学制度的实施，其

16 《明英宗实录》卷17，正统元年五月壬辰。

17 康熙《新会县志》卷八《学校》，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18 吴智和(1991)，《明代的儒学教官》，台湾学生书局，第9-19页。

19 《大明会典》卷78《礼部三十六》，明万历内府刻本。

20 (明)陆容(1993)，《菽园杂记》卷13，中华书局，第158页。

21 陈宝良(2005)，《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0页。

22 郭培贵，《试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文献》1997年第4期。

效果并不理想，地方儒学鲜有改观。

(二) 书院的发展

官学教育功能的衰落，促使地方官员、提督学校官思考补救之途径，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书院。书院在扩展教育范围、扩大教育规模、集中优秀学生进行科举训练等方面适应了当时的需求，官员在书院建设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²³据学者统计，有明一代各类官员创建书院972所，占明代书院总数的57.21%。²⁴自成化朝开始，明代书院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官员创建、修复书院亦兴盛起来。²⁵提学官兴建书院的活动，甚至引领了明代书院建设的风潮。²⁶随着书院在教育中持续发挥作用，士人、官员对书院的认识已不同于明初，他们认可了书院补官学之不足的地位。正德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1473-1530)曾为蒲州河中书院作《河中书院赋(有序)》，又为江西余干东山书院、进贤钟陵书院作碑文，在这三篇文章中，李梦阳“基本上把官学体系视为唯一的培育士人的场域”，在科举必由学校的选士制度下，将书院作为官学的延伸。²⁷

隆庆五年(1571)，御史李明谷增建橘园书院，冯承芳为之作记，在记文中提及书院的功能：“学校所以教士也，学校荒矣，于学校之傍为书院，所以辅学校之不及也。士业其中，而无以养之，则治生不暇，而暇精于业哉？科目乏人，无怪其然也。今既有书院以居士，又有学田以养之，择严师以教之，将来人材造就，为时效用，裨益国家，端有望矣。”²⁸认为书院之建，可以居士、

23 吴德宣，《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365页。

24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第285页。

25 据吴德宣统计，自成化朝开始，官员兴建书院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见吴德宣，《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364页。

26 参见赵伟·邓洪波，《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

27 王昌伟，《李梦阳与书院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28 (乾隆)《岑溪县志》卷2，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养士、择师教士，能够“辅学校之不及”。

嘉靖四年(1525)，巡按御史潘仿增修杭州万松书院，选俊彦肄业其中，王阳明为之作记，在记文中，王氏称：

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旌旗，悬非格之赏，以倡勇敢，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今书院之设，固亦此类也欤！士之集于此者，其必相与思之曰：既进我于学校矣，而复优我于是，何为乎？宁独以精吾之举业而已乎？便吾之进取而已乎？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²⁹

王阳明关于书院的论述，代表了另一部分士人对书院功能的理解。就士人而言，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他们理想中的学校，是三代的庠序之教，其宗旨在明伦，以此为基，至于天下大治。³⁰学校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士子致力于辞章利禄之学，同原来的宗旨渐行渐远。而书院能够讲求古圣贤之学，正是“怀世道之忧者”挽救学校沉溺俗学“措力”之所在，能够匡正学校，弥补其不足。王阳明的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嘉靖三十七年(1558)夏浚纂《怀玉书院志》，在论及“名区胜地复有书院之设者何”的问题时，也沿用了王阳明的说法。³¹

29 (明)王守仁(2011),《王阳明全集》卷7《万松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1-283页。

30 成化二十二年(1486)，朝廷申明王府婚姻禁例，明宪宗谕各王府时即称“伦理明则风化行，纪纲正，斯天下定”(《明宪宗实录》卷279，成化二十二年六月乙酉)。地方士人也深以明伦为重要，“学校之设所以明伦也，伦理明则贤才兴，贤才兴则风俗厚，此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也。(明)张孟仪，《永嘉县儒学新修庙学记》，收入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81页)。

万历年间，提学御史杨廷筠在为《虞山书院志》所作的序文中，也表达出书院可以辅助官学的观点。杨氏称：“或者乃谓，当今国有学，若郡若县莫不有学，书院所讲之学独何学与…故养之以学校，其防甚峻；作之以书院，其门似广。防峻犹驯习于耳目，而门广足洗发其精神。苟人之精神一经洗发，将还顾其寻常耳目，亦自有旷然一新者。是书院也，岂不为学校之忠臣哉？”³²杨廷筠将书院比作学校的忠臣，认为书院能够奋士人，洗刷学校之颓废风气。这依旧没有脱离书院辅学校之不足的范畴。叶向高甚至称：“（学校）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³³将书院之兴起与官学之弊端联系起来。明代文献涉及书院时，将其作为官学辅助的论述颇多。甚至在为官学所作的记文中，也提到了书院辅助官学的作用。³⁴

要之，明中期以后，因官学在聚士、教士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兼之地方官员、士人普遍兴建书院产生的影响，社会上流行起一种观念：书院可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就书院如何能弥补官学之不足，上面的例子中，冯承芳称书院可以居士、养士、教士，此一概括颇为全面，文献中论及书院补充官学的功能无外乎此。另外，上文中王阳明、杨廷筠认为书院可以使士子远离科举俗学，以古圣贤之学自期，则是书院补充官学不足的另外一层意涵。尽管他们在表达书院的具体作用时或有差别，但将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这一理念却是一致的。实际上，至晚明万历年间，书院作为官学必要补充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³⁵

31 (明)夏浚，《月川类草》卷6《怀玉书院志目》，清抄本。

32 (明)张鼎·耿橘(2005)，《虞山书院志》序，姜亚沙·经莉·陈湛绮编，《中国书院志》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8-12页。

33 孙承泽著(2018)，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下)，北京出版社，第1134页。

34 嘉靖三十五年(1556)，霍州知州褚相重修儒学明伦堂，州人刘煦撰文记其事，在文中提到褚相创建霍山书院，“岂直辅学校之不逮而已哉”。见(道光)《直隶霍州志》卷25，清道光六年刻本。

35 书院作为官学补充的观念，在地方志的编纂中也有反映。明前期，不少士人·官

三、清代书院地位之确立

清军入关之后,明代的学校政策为清廷所继承.科举依旧是士子最为重要的进身之途,学校储备参加科举的人才.入清后官方恢复、重建旧有地方儒学,在新拓疆土上设立儒学,这在权力象征和官学普及层面上具有意义,但对官学教学的改善则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书院在教育方面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其作为官学补充的功用仍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各地书院逐渐恢复.³⁶

雍正、乾隆两朝的书院政策,改变了自明代以来书院在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雍正十一年(1773),世宗皇帝在谕旨中称:“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³⁷为后来官方支持书院发展确定了基调.在乾隆朝,高宗认可了书院“广学校所不及”的功用,并以省会书院为“古侯国之学”³⁸,将其置入儒学(府州县)—省会书院(省)这一教育体系之内.官方的政策刺激了清代书院的发展,到乾隆朝,地方普遍设立了书院.³⁹

书院的普遍设立及其影响,使得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就官方而言,明代朝廷颁发给提学官作为施政纲领的敕谕中未涉及书院,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廷所颁《学政全书》中已增入“书院事例”一项.乾隆朝以后,书院已然被视为地方行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书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官员屡有上奏,请求朝廷下令整顿.⁴⁰而在官方整饬学校的奏疏中,亦将书院包括

员在编纂地方志之时,将书院置入“古迹”“宫宇”.万历以后,书院多被置于“学校”之后.参见陈时龙,《明人对书院的态度—以明代地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第36-47页.

36 以往学界认为清初官方“不许别创书院”,采取了压制书院发展的政策.但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赵伟认为,“不许别创书院”系针对提学官而言,此政策对地方书院之建设并未产生太大影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书院兴建依旧频繁.见赵伟,《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35-36页.

37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

38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甲子.

39 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第177-190页.

在内。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御史周鸣銮奏请整饬学校、道光十七年(1837)御史巫宜禊奏振興學校、同治十年(1871)御史吴镇敬陈时政以资治理、光绪九年(1883)御史陈启泰奏请整饬学校以端吏治之本，都涉及到书院。⁴¹

书院在教育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但官学状况并未改善。“府州县学除了作为教官的衙署和在固定的时间举行祀孔典礼外，几乎没有其他用途，以致或被用来充作义学、社学之址，或被塾师作为授徒之馆舍，或被农民作为晾晒之场”，教官主要工作是掌管生童册籍、岁科送考，既不能教化训导士子，亦无须为参加科举的生童教授应考的技能，是“虽缺官百年，要无缺于得失”的闲职。⁴²清代专门记录地方儒学历史的儒学志，所载多是朝廷对孔子的尊崇、儒学祭祀等内容，并未涉及到对生员的教育、考课。⁴³可见清代在官办教育方面虽有府州县学之设，却无教养之实。

与官学的颓废相较，书院显示出其巨大优势。清代“一乡一邑皆有书院”，其数量远超官学，在教育普及方面作用明显。多数书院有详细章程，规定生徒选拔、山长选聘、学生肄业、膏火发放等办法，在这些方面，官学很难与书院相比。粤华书院山长梁廷桢即称：“未有书院之前，则教育专于学校，士子虽得读书于学，实则散处其乡，博士月有考课，或应或否，亦等若具文，规约之颁，既不如书院之严且密，而岁延名宿聚一堂，而与为问难，与为劝勉，其谆谆诱导之意，实较诸郡邑博士之半官半师者情事不啻倍蓰。又优待鼓舞之意，月有资，课有奖，单寒缝掖，担簦至止，如入其家。贍给一出，于是安心

40 就整饬直省书院而言，先后有嘉庆二十四年御史张元模·道光二年松筠·光绪九年给事中刘瑞祺奏请。

41 王炜编，《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第670页·769-770页·930-931页·第981页。

42 霍红伟，《晚清教育转型与府州县学的变迁》，《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43 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太仓州儒学志》，主要记载“宫墙·基址·堂舍·门庑·乐舞·彝器，以及师儒之官·科贡之姓名人物”。见(清)俞天俦，《太仓州儒学志》，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 第2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5页。同治《长沙县学宫志》亦只是记载朝廷对孔子的褒奖·官方崇祀历史·孔庙祭祀典礼·儒学财产等内容。见(清)周玉麒辑《长沙县学宫志》，同治七年刻本。

向学，无旅居之困，尤称便焉。所以培植人才月异而岁不同，有由来也。”⁴⁴非但书院山长认为书院在教育士子方面远较官学为优，主持教育的官员也有同样认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福建学政戴鸿慈在为《诗山书院志》所作序文中称：“国家广励学官，季有课，月有考，立法綦备，而诸生居处或百里或数十里外，或生事维系，终岁不一至郭门，讲解切劘，获益犹馥。书院则生童并肄，弦诵一堂，例延名宿耑掌教事，有膏火以供其朝夕，有朋友以备其观摩，有书策以资其流览，赏奇而析疑，稽古而居今。卜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此之谓也。”⁴⁵

一方面，官学失职，丧失了教育职能；另一方面，书院大规模兴建，其在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受到社会认可。朝野对书院的关注日多，书院的地位实际上发生了转变，成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掌教、主管地方教育的官员对此感受最深。曾在两广多处书院掌教的郑献甫(1801-1872)曾作《学宫议》一文，他称：“今之学宫乃古之所谓孔子庙，今之书院乃古之所谓学宫也。今之国子监犹存古法，而今之国子生遍天下，皆由纳粟而入，发名成业，固有终身未至者。其余乡学，但有孔子庙耳，非学宫也。其教职但作奉祠官耳，非学师也。学师之名其殆主书院者尸之乎？”⁴⁶郑氏视学宫为孔子庙，以学官为奉祠官，而将书院掌教当作真正的学师。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陕西学政许振祜上奏请求创建书院，许氏在奏疏中称：“国家作育人才，府县设学，复听所在举行书院，法良意美，得人称盛。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视为具文，平时因循居半。迨学政按临，所驻不过旬日，而又不逐日校艺，即有所牖迪，亦不过布条教、举大纲，至于教士之实，窃以为莫如书院。”也视书院在教育中的作用优于官学。⁴⁷

44 (清)梁廷枏(1995),《粤秀书院志》卷13《科名略》,收入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66-167页。

45 戴凤仪纂(1995),《南安市诗山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点校,《诗山书院志》卷首,厦门大学出版社,第3页。

46 (清)郑献甫(1975),《补学轩文集》卷2《学宫议》,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文海出版社,第751页。

实际上，“教士之实莫如书院”的观念，在乾隆朝书院大发展之时即已有之，当时的学者程廷祚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称：“方今用与取之法不可谓不详矣，而所谓教者，惟各省之书院。”⁴⁸至清后期，随着书院在养士、教士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观念更为普及，以至民国修《清史稿》的时候，史馆馆臣即认为“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⁴⁹。民国学者评价清代学校时也称：“清代的特殊学校为书院，而书院实为清代唯一的教育人材机关。”⁵⁰

结 语

明清五百多年，传统帝国的教育确实存在一种趋势。明前期官方构建了完整的学校体系，书院被排除在此体系之外，影响甚微。明中期以后，地方官员、提学官开始寻求学校之外培养人才的途径，将目光转向书院，引发明代书院建设的一个浪潮。在此背景之下，不少士人重新定位书院，认为它能够“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末、乾隆初，朝廷对书院的支持，激发地方官员、士人建设书院的热潮。随着书院在地方的普及，以及在聚徒课士、膏火养士等方面较于官学的优势，教育之重心转向了书院，以致产生了“教士之实，莫如书院”的观念。

诚如清人黄以周所言：“学校兴，书院自无异教；学校衰，书院所以扶其弊也。”⁵¹书院在教育系统中地位的改变，其决定因素之一即是官学能否履行

47 (清)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学校下》，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48 (清)程廷祚撰(2004)，宋效永校点，《青溪集》卷9《与陈东皋论书院书》，黄山书社，第208页。

49 《清史稿》卷160《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第3119页。

50 周子同，《中国学校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 第45册，第110页。

51 (清)黄以周，《傲季杂著·史说略》卷4《论书院》，清光绪二十年南菁讲舍刻本。

其教育职能。明清两代，朝廷不能有效祛除官学弊端，而士人接受教育的需求一直存在，这两种现实促成了书院的持续发展。书院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及士人书院观念的变化，最终影响到实践层面，这不仅反映在士人、官员为培植人才建设书院的热情上，更为重要的是，清末书院改制之时，政府选择以书院为核心，重建了一套新的教育体系，最终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格局的形成。

【參考文獻】

- 雍正《舒城县志》卷31《艺文》，清雍正九年刻本。
弘治《温州府志》卷20《词翰二》，明弘治十六年刻本。
康熙《新会县志》卷八《学校》，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 邓洪波曾指出(2012),《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国钧主编(1994),《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白新良(2012),《明清书院研究》，故宫出版社。
吴智和(1991),《明代的儒学教官》，台湾学生书局。
(明)陆容(1993),《菽园杂记》卷13,中华书局。
陈宝良(2005),《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王守仁(2011),《王阳明全集》卷7《万松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张鼐·耿橘(2005),《虞山书院志》序,姜亚沙·经莉·陈湛绮编,《中国书院志》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孙承泽著(2018),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下),北京出版社。
(清)梁廷桢(1995),《粤秀书院志》卷13《科名略》，收入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戴凤仪纂(1995),南安市诗山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点校,《诗山书院志》卷首,厦门大学出版社。
(清)郑献甫(1975),《补学轩文集》卷2《学宫议》，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文海出版社。
(清)程廷祚撰(2004),宋效永校点,《青溪集》卷9《与陈东皋论书院书》，黄山书社。

Abstract

From State-run Schools to Academies

—The Shift of Educational Focu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Yanwei*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ocus of education tended to shift from state-run schools to academ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Ming Dynasty, a complete scho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authorities. However, the academies were excluded. And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local officials and Tixue(提學) began to seek some other ways to cultivate talents which were beyond the state-run schools, and recognized the status of academy as “supplementing the deficiencies of schools”. In Yongzheng(雍正) and Qianlong(乾隆)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es was promoted by the authorities’ support. With the prominent advantages of academies in gathering scholars and teaching scholars, the educational focus gradually turned to academies,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idea that “the reality of teaching in schools is inferior to academies”. The status of academy in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es of scholars’ concept towards academy have affected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also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pattern ultimately.

Key word : state-run school, Confucianism, academy, educational focus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19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02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16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